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9月3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

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

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习近平强调，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习近平强调，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

成为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习近平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09月04日）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 100 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

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要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凝聚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我们必须坚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国家机关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

(二)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

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 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

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三)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 and 力量。我们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我们积极发展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广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我们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四)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所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

(下转第 24 页)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我们选取了其中一部分，谨供读者学习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专职副院长 周文

世界对中国走向“强起来”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不仅是因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大影响力，更是因为中国不断增强的“真理的力量”，不断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始终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抓住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国对发展的主题从未偏离，并以不断创新的伟大实践主动回应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和普遍性的发展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问题意识前瞻性谋划未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进一步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战略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破解发展难题、突围发展困境、厚植发展优势，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路径。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正是有了这些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从而为我国发展培育了新动力、拓展了新空间，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重要的一点在于四十年多来中国始终坚持在与世界相联系中发展自身，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把改革开放作为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又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制体制的重构和再造。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交出了令世人惊叹的“优秀成绩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自主持召开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重点改革文件三百多个，出台一千余项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绝大多数已经

完成，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为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始终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正是有了这一保障，才能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因此，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政治优势。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体现为总揽全局、同向发力的效率，体现为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体现为长远规划、统筹协调、决策和执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高速公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新能源的推广、数字化的生态互联网等等成就显著，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量子卫星、5G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中国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力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体现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新中国70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以自己的独特智慧谋求发展、战胜贫困，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根本性、历史性的解决。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现行联合国标准下，中国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全国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年均减少13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3.1%。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正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最佳注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体现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受到广泛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开始动摇，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今天的西方世界，由于沉迷于自己的理念而无法自拔，并把这种理念当成衡量现实和实践的标准，从而丧失了

解决问题和推进国家发展的能力，治理绩效越来越难看。特别是一些西方个别大国奉行自身“优先”战略，重新拥抱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祭起反全球化的大旗，到处“退群”，成为冷战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不稳定不确定的罪魁祸首。

现在西方世界不仅仅是在经历困境，而且更是进入了一个“系统性失调”时期。正是西方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长期低迷，让世界更多向“东”看，从而更愿倾听“中国声音”、期待“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将中国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就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上的正式提出，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 and 时代价值，体现了中国的定力、智慧、责任与担当。

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将自己在现代化发展中获得的宝贵资金、发展成果、先进技术和脱贫经验，分享和回馈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用“中国智慧”破解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命题”，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搭上驶向现代化发展繁荣的“中国高铁”。

中国道路所蕴涵的新国际合作观和合作模式，避免了传统现代化发展中的地缘竞争陷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现代化进程中富国

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局面。这既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远见卓识，也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映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魅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中华文化立场以和而不同的眼光看待多样化的世界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化相比，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强大内聚力、延续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一些人总担心中国强大了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样的疑虑是源于他们在传统西方文明范式下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范式，源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完全没有顾及和观察到中国道路成功的路径。

中国发展既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展示了新的可选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参照。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开创了现代化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伟大复兴只会扩大同各国的利益

交汇点。当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过去西方发展的历史逻辑炒作“修昔底德陷阱”，声称国强必霸，大国崛起必然意味着掠夺与战争，强国即为“强权”与“霸权”，这只是西方兴起的历史映象。首先，中国崛起的路径不同于西方发展路径；其次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梦想与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伟大复兴只会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既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承诺，更体现了中国面对世界不确定性展示出的中国力量和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但重构了大国关系的理念，而且颠覆了传统大国关系的理念。这说明，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直接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

（来源：求是网 2019 年 8 月 14 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力量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陈培永

新中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 40 多年，已经明证，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繁荣发展的今天。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行”，在当代中国的根本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这是我们今天坚定理论自信、做到“四个自信”的坚实基础。

立足时代和实践的中国理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行？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只有这一理论而不是其他任何理论，能够及时科学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品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严格地基于文本解读和学理推演而生成，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深刻回答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深刻的理论创新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立于国际舞台、富涵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理论，行之有效的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坚持是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旦发展成一种学说并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如何才

算是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好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形成了明确认识，确立了基本原则，这就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紧跟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让理论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展示出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坚持与发展的两重奏，坚持是首要的。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把其称为“真经”：“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坚持不是固执，不是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从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中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坚持问题导向，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为解决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创新，不但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富有感召力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战略目标体系明确，其中既有近期目标，又有中期目标，还有长期目标。近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期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中国梦，长期目标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战略目标体系明确，其中既有小目标，又有中目标，还有大目标。小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中国梦，大目标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接下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追赶目标的问题，即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内容不仅涉及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涉及到制度、社会、价值、观念、能力层面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正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不是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而是实现高层次、高水平的现代化，它的实现意味着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

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在追求民族国家目标的同时，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和远大理想。这个相对完整的目标体系，兼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既立足中国实际又放眼人类社会发展，无疑富有感召力。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如果要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出现次数最多、最具有标识性意义、最为人所熟知的概念是哪一个，很多人的选择无疑将会是“改革”。改革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简单的一个界定，到现在恐怕还有人不知道到底有何深意。实际上，它讲清楚了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强调了改革对革命事业的传承，赋予了改革自身以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改革不是对革命的背离，而是对革命事业的重新谋划，它让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标，将智慧和力量用在改革上。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革命，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变革。这场变革的起点是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只是一个方面，虽然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它也很难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要发展生产力，要解放生产力，就要改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空间。

改革能够上升到革命的层次，说明改革不只是某个要素的改变，某个方面的改变，而是全方位的变革，是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经济生活、政治环境、文化模式、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改革是一场革命，强调的是改革的彻底性、艰巨性、综合性、复杂性、长远性。只有全方位的变革，才配得上革命二字。

与时俱进推进发展理念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中国国情，更加强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改革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与我们对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把发展提高到如此高度肯定有密切的关系。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清和用好经济建设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全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

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分析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发展趋势、发展挑战，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作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形态上的创新创造和概括提炼，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关系、各个方面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上升到全新境界，为全党在发展问题上提供了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科学指引。

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首先是因为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发展理念，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新发展理念也更加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为突出强调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

全面谋划国家治理战略

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充分研究的课题，但必然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如何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制度最关键。但硬性的制度要落实到治理主体的能力水平、价值理念、道德修养提升上，没有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信仰、精神境界的塑造，没有治理者本人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真正

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注重制度，而且同等注重治理者的能力、素养、价值观等方面。

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但并不是说制度完善，治理能力就强。国家治理的制度好，要落实为治理能力强。制度再完善，如果不能转化为能力，转化为成效，那制度好坏、优劣还得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治理能力作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方面提出来，有着鲜明特色，体现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力求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效能，以保证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处理好制度稳定和制度变革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开放发展

今天的中国凭什么能引领当今世界的开放发展，凭什么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是因为中国依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必须站在全球化时代的潮头之上，是因为中国善于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并能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代表着中国对人类社会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追求。这

既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又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所追求的美好社会的凝聚。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个倡议、一个概念，它还是一种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它的理念载体、落地之举、现实路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一个追求目标，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从严治党打造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领导力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国家治理，无论是实现民族复兴，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么就能行？这源于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这源于它一直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抓，努力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党自身的变化，在新的伟大工程中贡献了智慧，很好地回答了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建设强有力的政党这个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下党建规律、治国理政规律的战略考量和远见卓识。它是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做出自我调适和优化的过程，它源于“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忧患意识，来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清醒认知，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来源：求是网 2019年8月29日)

法治建设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支振锋

经济发展影响人们的获得感，法治发展影响人们的安全感。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成功从来不会是“单足跳”，而必定是步调协同的“集体舞”。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法治同样既是构成中

国奇迹四梁八柱的重要部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同样是中国发展故事中令人感佩的章节。

确定预期性：法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奇迹，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干出来

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给社会松绑，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双手往哪里使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让老百姓充满了力量，但真正让老百姓“干起来”，还有一个关键条件。那就是一个确信或预期：人身是自由和安全的，财产也是安全的。

法治的作用，就在于给社会提供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事不出于预期，人自难于早见”，“安所措手哉？”讲的都是一个确定性问题。有恒产者有恒心，关键就在一个“恒”字，指的是一种稳定、安定、确定的状态。只有在一个确定的状态下，人们才能规划人生、安排生活、发展事业。如果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或者“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干了收获却不是自己的，甚至连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人们就不会努力，聪明才智也不会充分涌流。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取得了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矛盾易发多发的剧烈变革之世，竟然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天地之间，人命最贵。2016 年，我国每 10 万人中发生命案 0.62

起。有比较才有鉴别，2015 年，美国的这个数据是 4.88，法国是 1.58，瑞士是 0.69，德国是 0.85；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北欧国家中，丹麦是 0.99，芬兰是 0.91，瑞典是 1.15。中国 0.62 的成绩，世界排名第 17 位。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之一。

2018 年，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在 142 个国家和地区采访 14.8 万名 15 岁以上公民，基于居民自身的安全感，发布《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中国获得 88 分，居民安全感排名第十。不管是外国旅客，还是本国居民，在中国都能放心地半夜“撸串”，女性也不用担心单身出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安全已经习以为常，感觉理所当然。而且中国还是在警察人数偏少的情况下，取得这样成绩的。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估算，全世界各国每 10 万人口警力数平均约为 300 人，只有不到十个国家的每 10 万人口警力数低于 100 人。中国每 10 万人只有 120 个警察，相比之下，美国有 245 个，英国有 307 个，俄国有 246 个，日本有 197 个。

除了人身的自由和安全，中国人能放心去“打拼”，还因为有财产安全有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改革开放以来，1978 年至 2014 年期间，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16 倍，超过 8.5 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大多数家庭都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2018 年中国公民出境游接近 1.5 亿人次，全世界“买买买”；全国已有 15 个城市、1.45 亿人达到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上海、北京和香港，均进入亚洲经济体量最大城市的前四名。财产安全的另一个方面，国际公认的是，非本国居民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营商环境的“风向标”和“晴雨表”。2018 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3.2 万件，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超过 350 亿美元。2018 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4.8 万件，较上年增长 9.1%；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为 24.4 万件，较上年增长 16.5%。

系统稳定性：法治成功的共同道路

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实质，就是以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相应的交易安全。在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安全依赖于法治。但法治保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靠“撸起袖子加油干”。而且，可能干得很艰辛，还不一定能够干成。法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和共同愿景。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以及切实的国家利益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法治是少有的共同语言，是当今国际最低限度的共识之一。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法治更是他们炽热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五湖四海、肤色不同、种族多样、政见歧异的所有人，几乎共享着一个全球性的法治理想。

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发展中恰恰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稳定问题。一旦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则万事皆休。某种意义上说，稳定是“一”，其他的都是“零”；没

有了稳定作为基础，一切归零。法治建设有助于经济发展、社会有序、政治稳定，而同时，法治建设的成功也有赖于经济发展、社会有序和政治稳定。

易言之，法治的成功一定不是单兵突击，而是协调共进，是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其他各领域建设相协同的系统性成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看作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这体现了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

整体协同性：法治建设的中国密码

是先有法治蓝图，严厉约束国家权力，然后大家都严格遵守法治、依法办事；还是依靠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精心布局，立法订制，逐渐完善法治？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浪漫理想，而后者才是许多国家筚路蓝缕建设法治的现实。

中国走的是现实主义的法治建设之路。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的“两步走”战略部署，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当然，目标高远，并不代表当下卑微。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能够位列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很好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这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成就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执政地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认为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认识自己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抓住关键少数，增强自我纯洁和净化能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而中国共产党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反对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到“四个全面”，从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这种咬定法治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法治建设，是世所罕见，也是

史所罕见的。这背后，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先进的、无偏私而又不断自我革命的执政党。

但这条路极端困难、艰辛。往这边偏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强大的“利维坦”，法网“密如凝脂，繁似秋荼”，不断吞噬个人自由和权利；往那边偏一点，可能就是国家能力孱弱，发展步履维艰，在列国竞争中掉队，甚至沦为无政府状态的失败国家，公民权利更是无从谈起。特别是对于广土众民的大国而言，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发展情况和诉求，国家必须保持法制统一，但又要给地方和社会留有余地，既要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要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发展如何规划，建设如何布局，资源如何投放，谋篇布局，必须步步精心。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千头万绪，都涉及到法治的保障。但法治并不是国家建设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既是重要的发展保障，又是发展的重要一环。经济发展、社会有序、政治稳定与法治昌明，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又不断在国家建设大局中相互竞争议程的优先性和资源的投放量。历史已经证明，能否在国家发展的全局中来布局法治，能否让法治适应国家发展的大局，绝不是浪漫主义的“随意选”，而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弹钢琴”。奏出美妙乐章的，也不仅仅是灵巧的十指，更是一颗智慧的大脑。在国家建设中，这个“大脑”就是国家能力大

小以及能否明智运用的关键，其实质就是需要一个坚强有力而又智慧自警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建设法治中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持续发展、稳健前行的重要保障。

（来源：求是网 2019 年 9 月 7 日）

厚植文化自信 增强战略定力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陈先达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本质上来源于文化自信。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强调文化自信特别重要。面对世界局势，面对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不可避免会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我们会深刻体会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文化自信不是哪一部分人的问题，其意义也不限于文化，而是关乎国运兴衰和民族未来的时代课题。

文化自信的依据何在？

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有历史根据，而且有现实依据。可以说，它是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的双重结合，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现实的可验证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中流砥柱。文化自信的根据，既在传统文化之中，又在现实之中，它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近百年的苦难历史证明，如果没有

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重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世界政党史证明，没有一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建党近百年，目标始终如一，朝气蓬勃，坚持自我革命；也没有一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长远目标和现实目标相统一，逐步朝既定目标前进。领导人可以换代，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变；实际政策和措施可以与时俱进，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实现历史使命的坚定性所表现的，是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巨浪，我们的文化自信力能经受任何考验。

对“源自于”“熔铸于”“植根于”应如何理解？

对文化的研究不能限于文化自身，必然要对文化和文化产生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既包括它的根源、发展及其现实基础。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问题。

不理解“源自于”，就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根。一个没有传统的文化，不知从哪里来的文化，如同水上浮萍，经不起风吹浪打，只能随波逐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空地中产生的，废墟上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如黄河、长江之水，有源头。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中华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是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我们的文化历经 5000 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在历史上，历代都有

杰出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积土为山，汇流成海。

如果说“源自于”回答了文化何以自信的“历史之问”，那“熔铸于”则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之根，更要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百年之变中“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是决定中国传统文化塞流断源，还是继续向前发展的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也没有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塞源断流，不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因为中国人民的顽强拼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这种文化走向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是文化发展中质的变革。不懂得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立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就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的辩证关系。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没有能够“熔铸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文化断流的历史宿命。

“植根于”则是关于推动文化产生、继承、发展的动力和文化的源泉问题。历史证明，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其他多种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它提供凝结为文化内容的源泉，而且提供继续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是我

们先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经验的精神升华；而我们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精神升华。不懂近百年来中国的革命奋斗实践，不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实践，就难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就不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何以“熔铸”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培植起来的。

强调文化自信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当代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导我们“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承诺，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民美好幸福而奋斗；也是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动员令，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入党誓言，进行自我革命；同时也是向世界宣告，任何外来势力都不要妄想中国共产党放弃中国道路，改变中国基本制度。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强调文化自信特别重要。因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因为缺乏文化支撑，就会因为理想和信仰的动摇，就会因为思想缺钙而失去信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势力用各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摧毁我们的自信。“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面对当前世界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的客观形势，我们一定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当然，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闭关锁国，拒绝文化交流。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民族自古就信奉“和而不同”原则，是最能吸收外来文化的。汉唐时如此，近代更是如此。当中国共产党还偏处陕北小城延安时，毛泽东就以他的世界眼光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注重文化交流，也更有条件进行文化交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

仅是一种经济交往，也是一种文化交往，除了经济价值外，在文化交流上同样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敦煌时特别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元素。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

就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用科学态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辨别精华与糟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化的科学态度，有力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和复古守旧的保守主义，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可继承性。毛泽东曾提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马

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导航器和推进器。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它被中国化成为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不再是所谓“异域文化”，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内容是与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而且就语言风格和气魄而言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我们只要读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引经据典所显示的中国风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强势攻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很难有文化自信的底气。

为什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度称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把文化放在整个社会结构及历史发展中来考察，而不是把文化看成凝固不变的，更不是把它高悬于思辨的太空之中。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总是与特定阶段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构成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当然，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创造的成果，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包括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价值。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会具有两重性，即超越性和时代局限性，这就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分辨，区分精华与糟粕；二是激活，通过与实践结合对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三是创新，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优秀基因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新概念、新观点。这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而且非一人之力，非一代学者之力。这应该是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有效的方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包含中国哲学智慧、治国理政经验、以及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众多思想成果。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思想占主导地位，但这种道德伦理特色不应遮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领域中丰富多样的色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应该放开我们的眼界和视角，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多样的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敦煌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传

统文化的激活作用。离开了这个原则，传统文化经典就只是一种文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难以与现时代相适应。

为什么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全民族的事情？

文化自信不是哪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然，文化自信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因为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中国共产党汇集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有理论、有组织、有纪律，是站在时代前列、引导时代潮流的政治集团，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文化自信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凝聚并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包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这是由这个群体的专业和职业特点决定的，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传人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

交流中，中国学者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更是对全体人民说的。全体人民的自信，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问题。人民是民族的主体，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牢固集合。离开了人民的自信，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抽象的；离开了民族的文化自信，所谓人民就会是一盘散沙。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人民是文化的主人。没有民族的文化自信，没有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信，就不会在这个民族文化土壤里培育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文化巨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仅仅靠少数文化名人，不可能撑起民族自信的大厦。只有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普遍树立文化自信，才能使文化自信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来源：求是网 2019 年 8 月 28 日)

(上接第 6 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我们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总之，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9 月 5 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来源：《求是》2019 年第 18 期)

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王东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河北“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河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重大政治任务 and 现实检验，举全省之力推进重大国家战略落地实施。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作为政治之责、为政之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

聚焦创造“雄安质量”，努力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历史性工程，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我们坚决服从服务国家大局，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京雄城际、国际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市民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白洋淀及流域治理和“千年秀林”建设初见成效。我们要紧紧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功能定位，加大推进力度，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展示范区和国家级新区规划建设的样板。

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进一步提升规划编制水平。按照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工建设的要求，按程序编制报批规划纲要、总体规划、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等。扎实做好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和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工作，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使规划更加科学。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工艺标准和节能环保材料，精心抓好交通、水利、能源、智能城市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打造精品工程、廉洁工程。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加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修复。围绕建设蓝绿交织、疏密有度、水城共融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 and 流域治理，突出抓好工业污水、城市黑臭水体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综合治理淀中村和淀边村生活污水，科学推进清淤试点，建立多水源补水机制，逐步恢复“华北之肾”功能。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明年实现3年造林30万亩的目标。

坚持突出主业、高端高新，加快打造“雄安质量”创新高地。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承接符合新区定位的高校、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大力培育高端高新产业，构建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着力打造体制机制新高地。把改革开放作为雄安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全面落实中央支持雄安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在管理体制、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在土地、财政、金融、住房制度等方面全面创新，探索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考核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

国提供示范。

聚焦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全面提升河北承接能力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问题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要求，自觉摒弃“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深入推进与京津新一轮战略合作，在协同发展上思想更加统一、行动更加自觉。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以更加务实精准的举措做好工作，推动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加强平台建设，优化承接环境。围绕确保承接的功能留得下、发展好，坚持有选择、有错位地承接。统筹全省产业发展布局，突出6个重大平台和35个重点平台功能定位，着力提升京冀曹妃甸、津冀芦台·汉沽、沧州渤海新区等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增强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吸引力。目前，北京95家医药企业已入驻渤海新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已签约亿元以上京津合作项目123个。

加强协同创新，培育发展动力。坚持把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作为推动河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围绕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积极承接京津科研机

构转移，加强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支持河北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京津开展深度合作，与京津共建科技产业园区 55 个、创新基地 65 个，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去年，吸纳京津技术交易额 204 亿元，同比增长 24.6%。

加强政策对接，提高合作水平。继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抓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张北至雄安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已全面开工，京张高铁已完成全线铺轨。围绕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市场一体化，完善政策措施，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引进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加强支持服务，推动融合发展。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增强对接和服务京津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为协同发展做出河北贡献。全力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大兴国际机场及临空经济区建设，推动廊坊北三县与通州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加快一体化和水平发展。做好密云水库、潘大水库等重要水源地保护工作，确保京津人民喝上放心水。

聚焦落实“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河北高质量发展步伐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是党中央赋

予河北的功能定位，也是省委、省政府必须履行好的政治责任。我们扎实推动“三区一基地”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功能定位，明确目标路径，扎实做好工作，推动河北发展迈上新台阶。

立足于发挥区位优势，加快培育现代商贸物流。目前，河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和铁路运营里程均居全国第二位，分别为 7279 公里和 7690 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 11 亿吨。围绕构建联通全球、面向全国的商贸物流基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资源整合和转型升级，加强物流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空港物流、智慧物流等高端业态，力争今年物流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8% 以上。

立足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河北产业结构偏重，必须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去年压减退出炼钢产能 1230 万吨，今年和明年再分别压减 1400 万吨。深化万企转型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型农业。省市明确主导产业，每个县确定特色产业，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立足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坚持以编制省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规划五级三类规划为契

机，明确城市定位，优化功能布局，进一步提高区域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加强县城改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立足于当好首都绿色安全屏障，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京津冀区域面积21.6万平方公里，其中河北18.8万平方公里，生态涵养和环境保护的重头在河北。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行动，突出抓好散煤治理、“散乱污”企业整治，加快污染严重城市“退后十”步伐，深化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强矿山综合整治，推进张家口“两区”建设，努力打造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聚焦“四个办奥”理念，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我们坚持把北京携手张家口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做好张家口赛区筹办工作。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完成筹办工作任务，确保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突出奥运标准，优质高效推进场馆和基

础设施建设。统筹赛事需要和后续利用，精心设计施工，推进云顶滑雪公园、冬奥村等在建项目建设，加快未开工项目启动实施，确保年底前竞赛场馆主体工程完工。加强交通、水电、市政、通信、气象等配套建设，加快环境整治和造林绿化，确保测试赛顺利进行。

突出服务保障，扎实做好赛事准备各项工作。坚持“三个赛区一个标准”，落实实战化、场馆化、规范化要求，运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提高安保、住宿、餐饮、医疗等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效率。加强协调对接，积极配合组建各单项赛事组委会和场馆运行团队，做到赛事活动万无一失。

突出宣传推介，营造浓厚的政治氛围、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围绕使冬奥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利用各类媒体及时宣传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展情况，举办吉祥物全球征集河北专场活动，大力宣传河北人民支持冬奥会筹办、迎接冬奥会到来的典型事迹和动人故事，充分展示河北良好形象。

突出奥运经济，培育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借势借力冬奥会筹办，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竞技水平，开展“健康河北·欢乐冰雪”等雪季系列活动，大力普及群众冰雪运动。培育壮大冰雪装备制造、休闲健身、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产业，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7月12日）

全面提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能力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田学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加快缓解首都“大城市病”，推进产业联动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从思想上更加深入认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意义，从战略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更加清晰把握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点难点，从高效承接与加快转型发展相结合的层面更加明确精准承接的政策举措。

深刻认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意义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刻认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意义，有助于客观评价成绩，理性审视问题，坚定信心再出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从战略层面看，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

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才能腾出更多发展空间，减少冗余功能，实现人口控制这一关键目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强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京津冀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分工合理、链式聚集、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极，将探路跨省级行政区区域合作新模式，为人口密集地区集约发展与协同发展提供借鉴。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先导性、引领性、关键性工程，无论是建设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还是全面提升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加快京津冀地区生态修复环境改善，抑或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补齐河北发展短板，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都是重中之重，是“牛鼻子”所在。

从实施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动一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于北京而言，要在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上双向发力，既要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优化核心功能，又要向雄安新区疏解，打造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只有坚持向内调整和外向发力，强化提升北京首都功能，牵引

非首都功能向周边城市疏解，才能在治理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为强化“四个中心”的首都功能创造必要条件。于河北而言，要坚持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重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主动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带动我省廊坊北三县一体化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打造承接非首都功能的专业化承接平台、微中心，形成集中疏解、集中承接与分散疏解、专业承接相结合的格局，打造形成以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为鲜明特色的新增长极。

综上所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进一步凸显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根本途径；其二，这是促进北京资源外溢、加强京津冀深层互动、缩小河北与京津发展差距、最终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牵动力。因此，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首要的、最核心的任务，是坚持问题导向、实现目标任务的关键所在。

精准高效施策，全面提高承接能力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推动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层面的规划对接、政策协调和执行合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

决定性作用，着力优化承接环境，统筹推进疏解项目建设，全面提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能力。

健全承接协调机制。在规划定位上，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完善工作任务书和路线图。在三地关系协调上，政府要做到超前谋划，加快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政策对接、配套有力、衔接高效的疏解承接机制。在承接主体建设上，突出聚集优势平台、鼓励集群承接原则，解决好承接微观主体间的过度竞争问题，实现稳妥有序承接。在组织机构保障上，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规划协调监督评价职能，完善京津冀三地协同办相关权责，发挥行业协会、中心园区、领军企业、社会团体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沟通协调作用。在协调机制完善上，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作用，有效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保障作用，充分发挥法治手段约束调节作用，以利益共享、成本共担、优势互补、统筹协调为原则，构建促进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

建设高质量承接平台。从实际看，有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建设聚集化、专业化的高质量承接平台是重要途径。要发挥好现有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按照定位明确、功能完善、软硬配套能力强的要求，本着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京津产业转移重点相衔接的原则，在全力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载地建设的同时，建设好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沧州渤海新

区、津冀芦台·汉沽协同发展示范区等重大平台和重点平台，构建功能定位清晰、承接重点突出、布局结构合理的重点承接平台体系，提升特色化专业化承接能力，增强个性化平台、微中心承接服务功能，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先在一定空间内聚集化、链条式、集中化布局。依托重点园区，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通过建立分校、分院和合作共建等多种形式，优化发展环境，承接教育、医疗等非首都功能，分流进京人员。根据对接功能的相关条件对园区规划进行修订，提升园区产业配套能力，改善基本生活条件。注重培育新的有发展潜力的承接平台。突出承接平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脉资源、攻关能力等综合优势，鼓励各地各部门积极对接、理性承接、合作建设，健全承接目标绩效考核机制，减少过度竞争和内部消耗，提高精准承接、高效承接能力和水平。

发挥协同示范效应。坚持试点示范，发挥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平台试点示范作用。积极总结经验推广应用，是加快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条有效途径。加强改革创新，在承接科技、教育、医疗等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选取协同发展示范区或

三地接壤且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先行建立试点率先探索试验，提高承接效果。共创“共建共管共享”管理模式，在产业转移、财税共享、社会管理等方面，京津冀率先进行共建共管共享先行先试。探索拓宽政府投融资渠道、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方式方法，围绕重大项目加大公共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发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京津冀城际铁路发展基金等作用，鼓励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多渠道多形式参与转移产业聚集区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优惠和土地指标配给政策。围绕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积极承接京津科研机构转移，加强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支持河北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京津开展深度合作。在雄安新区及重点高新区探索创新加快聚集更多领军人才、科研团队、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机制，通过内部优化和京津冀三地政策协同，协力加速解决河北人才、科技等创新资源不足问题。探索创新产业疏解承接、协同发展的信息及风险管控机制，建立京津冀三地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疏解承接过程中的资本合作、融资风险管控，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来源：《河北日报》2019年8月9日）

学史以增强爱党爱国情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造群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发布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应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毛泽东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还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强调“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化对党和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助于开阔眼界、提升境界，有助于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都蕴藏在历史之中。如果不学习

党史和新中国史，就无从理解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从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奥秘，无从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也就难以坚定理想信念。党史、新中国史不仅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而且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执着、对初心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令人肃然起敬。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从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可以深刻理解党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深切感受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进而做到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正确对待历史是爱国的前提和基础。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增强底气、骨气，形成爱国的理性认同。缺乏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不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不了解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探索和努力，就难以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不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难以形成对祖国强大的归属感、荣誉感。98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震古烁今，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是激励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奉献祖国的不竭动力源泉。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解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历程、发生的巨大变化，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

所肩负的使命任务，有助于培育和弘扬新时代的爱国情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鉴往可以知来。学习历史、领悟历史，把党史、新中国史修好，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运用历史思维，增强历史担当，党员、干部的爱党爱国之心就会更加醇厚、深切，党和人民事业就会行稳致远。

（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自觉践行新时代宣传干部的使命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副总经理 孙明旭

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方向目标、使命任务、工作重点、基本要求，把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对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原则、重点举措、组织领导、保障监督等方面内容作出制度性安排。在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深入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为抓手，自觉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强起来。

第一，举旗帜，为发展领航。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员工，推动工作。加强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进一步突出学习质量、深化学习研讨，切实增强学习针对性、有效性，充分发挥并放大示范带动效应。用好理论宣传阵地，结合改革发展实践做好理论研究阐释，不断丰富研究成果。深化理论宣讲，发挥各类宣讲队伍和学习平台作用，

面向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通俗化宣讲活动，推动理论学习、宣传阐释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第二，聚民心，为奋斗鼓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话语权，全面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用主题宣传引领方向，用形势宣传彰显主流，用政策宣传凝聚共识，用成就宣传鼓舞士气，用典型宣传树立榜样，营造团结一心、共兴大业的浓厚氛围。坚持主动回应关切、解疑释惑增信，加强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澄清模糊认识，有效疏导情绪，放大权威声音，掌握舆论主动。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分类处置，不断提高对敏感舆情和苗头性问题的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

第三，育新人，为事业选才。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抓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之成为全员共同价值追求。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弘扬新风正气，普及文明规范，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提高企业文明程度。加强全员道德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高员工道德素质。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注重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因人制宜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健全完善统战群团工作体系，为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供支撑。

第四，兴文化，为精神塑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战略引领作用。大力弘扬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与时俱进深挖石油精神时代内涵，加大力度开展石油精神解读阐释、宣传教育，推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石油精神成为中国石油的精神标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第五，展形象，为时代喝彩。把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地位作用，精准聚焦更好承担央企责任使命、争做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骨干力量，打造与世界一流标准相匹配的品牌形象。抓好对外宣传工作，围绕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媒体合作，构建听得懂、易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主动开展境外舆情监测、舆论引导，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和企业形象。加大典型选树宣传力度，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创新局面，关键要有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干部队伍。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两个维护”的表率。始终坚定政治信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切实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二是锤炼“四力”强本领，作攻坚克难的表率。要沉下身子强脚力，扎实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做到“脚下有根、脑中有料”。要见微知著强眼力，坚持从政治角度研判形势，从战略全局高度观察问题，练就一双能“见人之所未见”的独特慧眼。要多思多想强脑力，推动宣传思想工作更好体现规律性、增强时代性、富于创造性。要入木三分强笔力，多写多练多琢磨，把思想观点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地呈现出来。三是与时俱进抓落实，作守正创新的表率。注重工作实效，坚持效果第一，着眼效果谋划工作，围绕效果推进工作，面对难题敢抓敢管、敢于担责，稳扎

稳打不断把工作推向前进。强化创新思维，不断开辟拓展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路径，以创新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创新的举措打开工作上的新局面。四是身体力行树形象，作弘扬石油精神的表率。要坚持苦干实干不懈怠，在其位必谋其政，对待任何工作都以勤为先、用心投入、铆足劲头，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持兢兢业业、夙夜在公的精神状态，带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始终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对待工作。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坚决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9月6日）

培养具有奋斗精神的时代新人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李丽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大命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育新人”这一使命任务。培养时代新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时代新人”的基本特征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而奋斗精神无疑是当代青年成为时代新人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上，深刻解答了奋斗的内涵——奋斗是艰辛的、长期的、曲折的、幸福的；奋斗的动力——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而奋斗；奋斗的路径方法——如何奋斗等问题，为培养具有奋斗精神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引领时代新人立鸿鹄志，传承接力奋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

同人民一起奋斗。”时代新人的人生黄金时期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高度吻合，培养具有奋斗精神的时代新人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当代青年的最大幸运和最大际遇，也是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责任。”因此，时代新人应树立扎根人民、奉献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的鸿鹄之志；应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传承接力奋斗精神，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坐标下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

如何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引领时代新人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传承并发扬接力奋斗精神？其根本在于引导时代新人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一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坚定奋斗自信、树立奋斗志向。二是用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显其才的环境氛围增强时代新人奋斗动力，

激发时代新人历练奋斗本领。三是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男儿志在四方的理想信念锤炼时代新人的奋斗品格，使其永葆奋斗姿态，主动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人民一起奋斗、同人民一起前进、同人民一起梦想。

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时代新人奋斗品格，内化自觉奋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上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从远古时代，祖先以筭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开创刀耕火种的历史开始，自觉奋斗、不懈奋斗就成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精神标识，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接续前进的动力。可以说，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每一步都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奋斗的结果。中华民族也正是依靠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

如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时代新人奋斗品格，内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自觉奋斗精神？关键在于运用多渠道、多方式、多载体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懈奋斗精神彰显出来、传承下去。一是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革故鼎新、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养成积极进取，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的奋斗品格。二是用“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引导时代新人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保持理性平和心态、展现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三是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四是用“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辽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等至理名言；用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绵绵用力。

三、用中国革命精神激发时代新人奋斗内生动力，坚定永久奋斗精神

奋斗精神之所以可贵，在于越是面对困难和矛盾，越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每一位共产党人为革命永久奋斗的精神，都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斗志、情怀、品德、作风。

如何用中国革命精神激发时代新人奋斗的内生动力，使其树立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永久奋斗精神？重点是将英雄精神、革命精神的时代特征淋漓尽致的描摹出来、讲述出来。一是要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环境氛围。如通过讲述英雄故事、阐释英雄精神、广泛传播英雄人物“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的爱国情怀；“革命理想高于天”“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奉献精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大义凛然精神教育引导时代新人以英烈为镜子、为坐标、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先烈遗愿，继续他们未竟事业，永久奋斗。二是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激发时代新人奋斗的内生动力，引导时代新人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四、用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时代新人练就过硬本领，彰显艰苦奋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出“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的实质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艰苦奋斗

的形式有了变化，但艰苦奋斗的意义依然鲜明。因此，置身于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等一系列时间节点中的时代新人不仅要勇于奋斗，而且要善于奋斗；不仅要有奋斗的决心和意志，而且要有奋斗的策略和本领，要具备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真才实学和过硬本领。

如何用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时代新人练就过硬本领，使其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彰显艰苦奋斗精神？关键在于将改革创新精神中的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勇于开拓、勇立潮头的矢志奋斗精神刻画出来。一是用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到偏远的地方去，到一线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是用南泥湾精神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习惯，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三是用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学习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敢为天下先的锐意创新精神；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励志勤学、刻苦磨炼，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苦练党和国家需要的“十八般武艺”，在积累知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上下功夫，练就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所需的过硬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来源：《红旗文稿》2019年7月12日）

炎黄文化与民族认同

信阳师范学院校长、炎黄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俊

炎黄时代也被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筚路蓝缕、生生不息，留下了早期华夏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化轨迹，形成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国家的文明路径。这是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体”之路。它预设了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也彰显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

炎黄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部族集团。首先，黄帝族与炎帝族经过阪泉之战，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炎黄二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后来，华夏集团向东、向南扩张，分别与东夷、苗蛮集团通过战争而相互融合。三大部落集团融合后，随着夏王朝的建立，以王朝国家为框架凝聚成了最初的华夏民族。所以，华夏民族从其最初的生成过程来看，它是以炎黄为主干，又融合了部分东夷、苗蛮等众多部族集团而形成的，华夏民族在血缘上并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延续，而是以中原地区为其共同的地区，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在其诞生伊始就是一个文化民族。

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黄帝是其最主要的促成者。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黄帝之时，天下未定，“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黄帝“修德振兵”，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后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打败炎帝、擒杀蚩尤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由此成为“天下共主”。对战败者，黄帝并非赶尽杀绝。阪泉之战后，黄帝想方设法安抚炎帝族人，“择其优秀和平者，予以官爵以羁之，封之国土以容之，崇其明祀以縻之”（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让原本兵戎相见的炎黄二族，最终得以化解积怨、消除隔阂，视对方为同族，彻底融合在一起。擒杀蚩尤后，黄帝同样也是采用怀柔策略安抚蚩尤旧部，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归附自己。后世圣王，特别是那些开国明君，纷纷仿效黄帝这一做法。如商灭夏后，商汤“封夏之后”（《史记·夏本纪》）；周灭商后，周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黄帝以战促和，以德报怨，成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融合，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路。

从炎黄到尧舜，再到夏商周三代，在不断征伐与融合中，东夷、苗蛮、夏人和商人

等逐渐消失了。诚如王震中所言，在两周时代，始于夏代的华夏民族经历了由“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升华，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已经存在，但作为自称亦是称的“华夏”之类的民族称谓还未出现，故称为自在民族，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诸夏”“华夏”之类的民族称谓频频出现，这是这种民族自觉意识的强烈表现，故属于自觉民族（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就民族融合而言，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并没有停止，秦汉时期人口众多、文化趋同的汉民族就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又进一步融合了蛮夷戎狄等族群发展而来的。

中华儿女在姓氏来源上对炎黄二帝的“认祖归宗”，亦是炎黄文化促进民族认同、民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方面。

姓氏是标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及其相关文化内涵的符号。姓的本质是血缘性，同姓一定是出自同一个祖先（封建时代的“赐姓”现象除外，因为“赐姓”所体现的已不再是血缘上的同宗，而是文化上的共祖）；氏虽然社会性更明显，但也往往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

秦汉之前的姓氏谱系原本是多元的。如《庄子·胠篋》所载十二古帝均有姓氏。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了以黄帝为主支谱系的文化认同。《史记》将《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司

马迁此说原出自《国语》。《国语·晋语四》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姁、僂、依是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昌意——颛顼（舜、禹）；二是黄帝——玄嚣——嵞极——帝喾（尧、商、周）。不仅尧、舜、禹（夏）、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郑樵《通志·氏族略》云：“虞有二姓，曰姚曰妘。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妘水之居而姓妘。”陈、田、姚等皆出自舜族。禹族姓氏有禹、夏、党等，楚族姓氏有熊、屈、伍等，尧族姓氏有刘、祁等，商族姓氏有殷、商等。周族姓氏无论种类还是人数皆为最多。可见，从姓氏来源看，中国绝大多数姓氏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黄帝。

姜姓是炎帝的直系子孙，《国语·晋语四》称“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哀公九年》亦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春秋时期姜姓人群不仅数量众多，分布也挺广。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与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考证，炎帝后裔的姓氏，除姜、齐、许、申、吕之外，还有伊、纪、向、甘、薄、赖等。可见，在中华姓氏谱系中，炎帝也是不可或缺的始祖之一。

《国语·周语下》云：“夫亡者岂絜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正是因为炎黄在中华姓氏谱系中的源头地位，“同宗共祖”的观念才会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之共识。当然，仅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每一位中国人不可能都是炎黄子孙。但是，以炎黄为始祖的姓氏谱系，从本质上讲，它并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祖源记忆，更是一种文化认同。所以，在思维习惯上固然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但实质上是以文化为内聚的。时至今日，以炎黄为始祖的中华姓氏谱系，对促进民族认同、民族凝聚，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古文献记载，神农之治天下，“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淮南子·主术训》），神农为寻药而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黄帝之治天下，“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白虎通义》）。炎黄二帝所体现出的这种修道德、行仁义、牺牲奉献、协和万邦、创造发展等精神，我们称之为“炎黄精神”，它既是民族精神的源头和根脉，也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因。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炎黄文化、炎黄精神的内涵也都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经过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弘扬，最终凝练、升华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渗透进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从古至今，“中华”“中国”之称谓，都是与炎黄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地域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炎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就文化方面来说，它指的是炎黄及其后裔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尽管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自觉的“中华”认同，即都是“中国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炎黄二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炎黄文化、炎黄精神也是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讲，就是以炎黄精神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中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炎黄精神代表着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而炎黄正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

（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6月1日）

未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改革方向

《前线》2019年第8期刊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文章称，近日，国资委发文，提出在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控股的比例不低于34%就可以了，员工持股不高于总股本的10%，这个规定很好地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

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例如，汇金公司管了几十万亿元的金融资本，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有其股份，汇金公司对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委派一个董事或副董事长，参加它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参与它的重大经营决策，至于具体的经营管理，都交给商业银行自己负责。

未来纯国有或纯民营的单一所有制的企业，会越来越少，混合所有的企业会越来越

多。我们去浙江、江苏调研就可以看到，好多企业里面既有国有股，又有集体股，又有员工个人股，上市公司还有社会股。而且一个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要想办好，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股东，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必须大于大股东的比例，这样才能形成制衡和公正的决策机制。

如何把握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过度向资本倾斜。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经过二十几年不断摸索作出了一个贡献性的解答：把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保持在3:1比较合适。如果按资分配比例过高，那些持股较多的老员工就不愿意干活了。企业新增利润的分配一定要向第一线作出贡献的人倾斜，向创造技术成果和开拓市场的人倾斜。

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在所难免

《经济参考报》2019年8月17日刊登陈涛文章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强力带动下，我国经济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一是消费的“压舱石”作用凸显。二是高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三是高端产品全球竞争力也在增强。尽管如此，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转换期的阵痛在所难免。从市场主体看，旧业态旧

商业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较大冲击，如果不能有效利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那么生存空间很可能会遭受挤压，主要表现为盈利能力下降，亏损面扩大。从市场供给看，若旧产品和旧服务无法做到与时俱进，与市场同步，就会导致市场供过于求，引发价格下跌。从市场结构看，大多数旧产业的生产设备、技术工艺、管理模式等需要升级

迭代，导致相关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市场价值大幅下跌。因此，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期，很可能会增加制造业产值、工业生产者价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等宏观经济运

行指标的波动，这属于正常经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转换期阵痛反过来也会催生新的市场需求，激发新的市场活力。

用改革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经济日报》2019年8月8日刊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文章称，我国消费潜力、内需潜力及由此蕴藏的增长潜力不会自动释放出来，也不能主要通过宏观政策调整来刺激，它依赖于相关的体制机制环境，这就需要“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第一，以进一步的市场开放扩大有效供给。有效释放消费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力度，以市场机制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第二，以农村改革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要在加快推进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农村“三块地”改革进程，明显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第三，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快完善社保制度，解决消费后顾之忧。第四，以进一步开放释放消费潜力。通过与全球市场紧密结合，不仅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能提升相关领域的竞争度，推动相关企业转型升级。

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 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经济日报》2019年9月2日刊登长篇文章称，尽管当前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但目前宏观层面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基础是坚实的。特别是今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成效已经开始显现。因此，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绝不搞“大水漫灌”式刺激，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保持经济平稳

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合理稳定投资需求和预期，特别是合理加大民生领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但不能重蹈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更要吸取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导致房地产泡沫剧烈膨胀、推升全社会运行成本的教训。二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引导和促进消费需求释放。同时，政府部门要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扶贫攻坚战略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针对

社会弱势群体的财政补助和支持机制。三是
全面落实财税支持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增
强经济内生动力。

打破路径依赖 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经济参考报》2019年8月2日刊登陈涛文章称，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房住不炒”，并首次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宏观政策取向。目前，房地产发展存在着三种路径依赖，一是从稳定地方经济增长政策取向上存在房地产稳定增长路径依赖，二是从投资策略上形成了房地产投资路径依赖，三是从心理预期上形成了房价向上运行路径依赖，

因此，房地产天然存在非理性运行的风险。综上所述，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提升地方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应从五个方面发力

《经济参考报》2019年8月7日刊登重庆科技学院教授唐龙认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国际产业竞争博弈焦点和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主要释放点。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确保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重要支撑。新世纪以来，智能化技术大发展与绿色约束的倒逼机制为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并将经济逐步导入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了巨大机遇。未来可从五个方面全面发力，把新发展理念与新要求融入到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第一，注重产业链的竞争与产业融合发展。第二，重视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城乡平台支撑。第三，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引领。第四，强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促进新旧发展动能的转变。第五，关注产业结构优化的绿色低碳和民生导向。

“破7”影响有限 汇率稳定可期

人民币对美元离岸和在岸汇率先后突破“7”的整数关口，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经济日报》2019年8月6日刊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文章称，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完善和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也会增强，对于是否“破7”无需过度关注。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国际收支平衡、金融风险可控，人民币汇率指数稳定，相反美元指数仍有继续下跌空间，人民币对美元不存在贬值基础，预计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

“中国经济是人民币的‘定海神针’。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如果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仍有明显优势，保证了人民币没有大跌的基础。”黄俊表示，人民币“破7”对市场心理的冲击远大于对经济本身的冲击。中国央行应做好市场预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心理稳定了，“破7”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化为无形。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善，出口部门竞争力强，进口依存度适中，人民

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有很强的调节作用，外汇市场自身会找到均衡。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增长韧性较强，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财政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上述负责人说，特别是在目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稳定性相应更强，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会产生恐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完全是自己吓自己”。余永定认为，一方面，中国经常项目仍是顺差，不存在很大换汇压力；另一方面，资本外逃已不像2015年、2016年时那么容易，短期内外资也不能把大量利润汇走。

外债风险总体可控，外债可持续性仍有较大空间

《中国金融》2019年第8期刊登叶海生文章称，借用外债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利用外债资源有助于一国经济发展，但如果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外债，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全球经济下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外部环境突然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极易产生债务风险甚至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横向比较看，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国际上用于衡量某一经济体外债潜在风险的指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于衡量一经济体外债偿付能力的指标，如负债率（外债余额/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一经济体外债规模与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其国际公认安全线为20%）和债务率（外债余额/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收入，反映外债的可持续性，通常出口能力越强表明外债清偿能力越大，其国际公认安全线为100%）等；

另一类是衡量一国是否有能力获得足够的流动资产以履行其短期外债偿付义务或是否面临流动性问题等潜在外债风险的指标，如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反映当一国偿还外债的其他支付手段不足时，可动用外汇储备资产来偿还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能力，其国际公认安全线为100%）和短期外债占比等。从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2017年末外债风险指标的国际对比情况看，目前我国主要外债风险指标均在国际公认安全线以内，外债整体风险可控，外债可持续性仍存在较大空间。2018年末，我国外债负债率为14.4%，债务率为74.1%，偿债率（外债还本付息额/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其国际公认安全线为20%）为5.5%，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为41.4%，均在国际公认安全线以内，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整体水平。